

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

第

十

六

辑

中文社会科学索引（CSSCI）来源集刊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中文社会科学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第

十

六

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黄河主编.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 2015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16辑)

ISBN 978-7-208-13367-9

I. ①一… II. ①黄… III. ①区域经济合作-国际合
作-研究-中国 IV. ①F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48566 号

责任编辑 汪 娜 赵荔红

封面装帧 王小阳

•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第十六辑 •

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

黄 河 主 编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o)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16.5 插页 4 字数 250,000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3367-9/D·2752

定价 40.00 元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6 / 2015

《复旦国际关系评论》第十六辑 / 2015 年
FUD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16/2015
主办单位：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主编：黄 河

学术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或字母排序）

Callahan, William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樊勇明	复旦大学
冯绍雷	华东师范大学
黄仁伟	上海社科院
金灿荣	中国人民大学
Lampton, David	美国霍布金斯大学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秦亚青	外交学院
沈丁立	复旦大学
石之瑜	台湾大学
Telò, Mario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ULB)
王正毅	北京大学
杨洁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
郑在浩	韩国首尔国立大学
Zweig, David	香港科技大学

编辑委员会（以姓氏拼音排序）

白沙天	包霞琴	薄 燕	陈玉聘	陈志敏	何佩群	黄 河	蒋昌健
秦 倩	沈 逸	吴澄秋	肖佳灵	徐以骅	俞沂暄	袁建华	张 骥

编前语

黄 河

当今世界正在发生复杂深刻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国际投资贸易格局和多边投资贸易规则酝酿深刻调整,世界贸易组织多边谈判举步维艰,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区域经济一体化和贸易协定“碎片化”趋势同步增强,各国面临的发展问题依然严峻。在上述背景下,2013年9月和10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国家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以下简称“一带一路”)的重大倡议,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和有关国家积极响应。共建“一带一路”的重点在于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到2015年年底,中国已同70多个国家和诸多地区组织建立起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助推了亚欧非大陆的整体振兴。在上述“一带一路”战略思考下,中国正在不断拓展国际合作新空间,全方位推进沿线国家双边、多边和区域、次区域合作。

本辑《复旦国际关系评论》以“一带一路”与国际合作为主题,共有14篇论文。主要从创新合作机制、海外利益、公共产品以及世界政治经济四个角度分析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基本内容与内涵。

一 “一带一路”与创新合作机制

“一带一路”战略在促进生产要素区域或者跨区域流动的同时也对国

际政治经济体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我们知道,全球生产网络不只是单纯的价值链增值活动,更是一个复杂的政治经济体系。“一带一路”沿线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不一,在产业结构、经济规模、贸易体系、资本市场、制度建设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我国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促进区域及区域间经济合作依然存在不少制度性障碍。

张贵洪、邱昌情在《“一带一路”建设与南南合作创新》一文中指出,“一带一路”沿线已经存在诸多区域和跨区域的经济合作机制,并且由不同的地区大国倡议和主导。这些合作机制包括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协议(RCEP)、跨太平洋伙伴协议(TPP)、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海湾合作委员会(GCC)、东非经济共同体(EAEC)、上海合作组织(SCO)等。“一带一路”与这些地区合作机制确实在地理和内容上有交叉和重合之处。如何与既有机制协调关系,寻求机制对接和互补是“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正视的现实问题。而合作机制的对接,需要有关国家合作提供公共产品,特别是基础设施类公共产品,以契合“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实际需要。

在全球性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或无法满足其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把只服务于特定区域或跨区域,其成本又是由区域内或区域间国家共同分担的安排、机制或制度称为“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一带一路”作为一个整体平台,在该平台下的诸多跨国活动具有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属性。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地区逐渐形成了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供应的新格局。中国通过主导“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公共产品的提供,可改善因美日欧经济停滞所导致的公共产品供应能力的不足,推动沿线各国现有合作机制的对接与耦合,形成一个以中国为中心节点的合作体系网。

杨海燕在《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合作机制探析》一文中认为,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的供给虽然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但是并非完全无解,博弈论的分析模型至少可以推导出三种解决公共产品供给的合作机制。在“一带一路”的具体推进过程中,可以根据具体公共产品的特性、相关利益国的结构性角色和价值定位,以及特定的情境,来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合作机制。例如,具体到“一带一路”项目来看,很多区域性或区域间公共产品,都可以基于“小集团”的模式来有效供给。我国在《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和行动》中,明确

了“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即基础设施联通、投资贸易合作和资金融通,希望借此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欧非之间的基础设施网络,优化区域内或区域间产业链分工布局,促进产业集群发展,推进亚洲货币稳定体系、投融资体系和信用体系建设。同时,我们也要“相机抉择”,适时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人民币清算体系是重要的金融基础设施。

彭兴韵、齐璠在《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与未来的发展》一文中认为,有了海外人民币清算机构和支付清算系统,离岸市场持有的人民币资金才能够自由地进行支付结算,人民币跨境贸易、投资和金融交易才能够顺利进行。同时,只有将人民币清算控制在中国商业机构手中,才能掌握人民币业务的定价权。可见,商业银行的海外布局和支付体系在新形势下的升级改造,对建立人民币清算网络至关重要。事实上,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中国商业银行国际化布局也在不断铺开,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的境外网络都已扩展至40个国家和地区,跨境支付体系的研制也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为人民币清算体系的建设提供了重要基础。

徐长春在《全球治理博弈视角下的“一带一路”》一文中认为,作为国际金融危机治理博弈的产物,“一带一路”既是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深入发展的结果,也是历次全球经济危机治理方案的升华。顺应时代需要,“一带一路”推动互利合作共赢理念深入人心,推动全球治理在价值取向上更加注重互利共赢,推动在治理内容上更加注重与国际产业链下游经济体的合作,推动区域融合由欧亚大陆向全球扩展。“一带一路”是针对全球问题的首个中国战略方案,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里程碑。

二 “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

改革开放30多年,我国取得的成绩举世瞩目。2014年,我国经济总量首次突破10万亿美元大关,外汇储备3.8万亿美元,连续十年保持世界第一。220多种工业品产量居世界第一,连续三年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全球10大港口中,我国占据8席。继续保持世界第一大进出口货物贸易国地位。人民币成为全球贸易结算第六大货币,三年提升三个名次。对外投资突破1000亿美元。截至2013年底,中国投资者在境外

创立 25 413 家企业,海外资产达 6 万亿美元,分布在全球 184 个国家或地区。2014 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突破 1 个亿。出国留学人数 45.98 万人,留学生总数达 170 多万。总之,当前中国海外利益遍布全球。

近年来,在地缘政治上,目前在欧亚大陆由东向西正在逐渐形成一个“社会政治动荡风险弧”,包括中南半岛、南亚、中亚、西亚及北非在内,地缘上与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及多个海外投资重点地区重合,推升了中国海外利益整体面临的风险。因此,就保障我国海外利益而言,海外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吴磊、王涛、曹峰毓在《地缘政治视域下的东非油气资源开发》一文中认为,“9·11”事件后美国所进行的反恐战争最重要的意图之一就是“把世界上存在安全隐患的油气产区进行重新切割,使之处于美国的保护之下”。具体到非洲,美国早在 2005 年便以共同打击恐怖主义的名义向泛萨赫勒(pan-Sahel)和马格里布(Maghreb)地区的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实施了“跨撒哈拉反恐伙伴计划”(Trans-Sahara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hip),在西北非几乎所有产油国保持了军事存在。美国也密切关注东非油气资源的开发并在国外安全领域加强了影响。在 2011 年与 2012 年,美国分别以打击圣灵抵抗军(Lord's Resistance Army)和索马里青年党(Al-Shabaab)的名义向乌干达、吉布提与肯尼亚派驻军事人员,并帮助这些国家进行部队培训。这些军事行动,使美国将自身影响力辐射到东非油气产区。在未来,各国出于势力均衡的考量,东非地区短时间内将不可能出现区域内主导性国家,某一地区外大国的支配性势力也很难建立。在东非的能源博弈将会更加激烈,任何一国都不会独占鳌头,东非油气资源的战略价值将因此大大凸显。中国在参与东非油气开发的过程中,应将其放在国家崛起和“一带一路”的大战略中进行全局性考量。

汪段泳、赵裴的《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公民安全风险调查——以刚果(金)为例》一文以在刚果(金)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为案例,结合对英国外交部“国外旅行建议”和中国外交部“出国特别提醒”所做的文本解读,对在撒哈拉以南中国公民的安全风险状况作了分析。主要研究结论有:(1)撒哈拉以南安全风险以治安罪案为主,覆盖面和伤害率都远超出恐怖袭击威胁;(2)撒哈拉以南中国公民高风险人群以企业外派、个体私商等长期居留人员为主;(3)安全风险的主要威胁源是来自当地各类官方机构的“合法伤

害”；(4)我国海外公民保护能力的缺陷存在制度性原因。

黄河、陈美芳、汪静、高姝涵在《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及权益保护》一文中，认为“一带一路”沿线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涉及的主权国家众多，任何国家都无法独自面对并加以解决。因此，中国只有树立更加开放合作的理念，才能调动区域内或区域间各方积极参与这一战略实施，最终实现互利共赢。事实上，中国一直在沿线国家间秉持安全领域的合作。截至2014年8月，中国已经连续、常态化地派出了17批次编队执行护航任务，为5670余艘中外船舶实施了安全护航，成功解救、接护和救助了六十余艘中外船舶。未来，中国在安全类公共产品的提供领域仅仅提出理念是不够的，还需要进一步落实到具体实践中去。中国需要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具体需求，积极提供区域性或区域间安全治理的公共产品，引领区域性或区域间安全机制的构建，逐步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区域性或区域间安全共同体。

三 “一带一路”与公共产品

在具体的公共产品提供领域，卢光盛、张励在《论“一带一路”框架下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公共产品”的供给》一文中认为，澜沧江—湄公河是影响“一带一路”六大经济走廊之一的“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一带一路”规划中“打造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新高地”的关键要素。近年来在澜沧江—湄公河的水利开发、航道利用、生态保护等方面频频引发问题，并引起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在政治、经济、安全等领域的分歧，其中引起这些问题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是跨界水公共产品已不能满足流域内国家对水资源开发的需求。因此，如何利用好“一带一路”发展契机及中国重视公共产品提供的意愿，将成为解决澜沧江—湄公河开发治理的重要途径，同时这也将反过来有助于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实施。

中国在未来的跨界水公共产品供给内容上，应该通过确保供给内容的广度与深度来体现中国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诚意与决心，并助推“一带一路”的建设。第一，先要确保现阶段流域内常规跨界水公共产品的生

产与供给,即水能资源开发和通航领域的纯公共产品供给,为实现水资源开发而进行的基础设施建设的俱乐部产品供给,以及以水资源开发技术交流、技能培训为主的混合产品供给。第二,重点努力建设机制保障类的跨界水公共产品。“一带一路”的倡议体现的是中国利用自身的发展优势,在周边构筑一个新的合作框架。系统合理的跨界水公共产品的合作框架自然也应包含于其中。因此,面对现今区域内湄公河委员会无法很好地解决澜沧江—湄公河治理问题,中国要主动担起责任,努力建设机制类的跨界水公共产品,具体包括供给模式、供给机构、保障体系三方面。在供给模式上,根据流域国家对跨界水资源的不同需求,进行共同协商,借鉴应对气候变化中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充分发挥各国的比较优势,同时利用中国在经济、技术等方面的优势,重点发挥其在跨界水公共产品供给中的主导权。此种供给模式能够将地区利益同国家利益相联系,在不损害地区利益的基础上,优先满足区域内成员国的共同偏好,使流域国家,尤其是下湄公河国家成为跨界水公共产品的直接受益者。同时,还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下湄公河国家在公共产品供给中的积极性。在供给机构上,供给机构可以是独立于任何一个现有框架的全新机构(例如设立“水命运共同体”组织),也可以是在大湄公河次区域框架之内新设的一个水资源专属的合作开发机构,来配合全流域的跨界水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满足上下游国家对跨界水公共产品的需求。在保障体系上,要建设具备能够保证跨界水公共产品的正常开发,保障流域国家的合理收益和应对域外国家的恶意跨界水公共产品介入的能力。

孙溯源、杜平在《“一带一路”与中国在中亚的能源合作:区域公共产品的视角》一文中认为,中国在中亚的能源合作中享有充分的政治互信,而且有足够的能力和强烈的意愿提供区域公共产品。中亚国家对于中国良好的政治信任,保证了中国在中亚能源合作中连续取得突破性进展,甚至在中亚能源合作中获得某种“特殊”地位。目前,中国在中亚周边构建区域能源市场的时机逐渐成熟。中国可以扩大能源贸易中本币结算的规模,逐步形成天然气定价和交易机制,从而为稳定中亚能源市场提供制度保障。中国还可以凭借自身稳定的市场和金融支付能力,为中亚能源市场提供应对价格波动和市场风险的公共产品。在今后的一段时期中,如何通过“一带一路”战略为中亚能源合作进一步提供有效的区域性公共产

品,将是决策者、智库和企业界需要共同面对和思考的命题。相信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将更有能力和必要为中亚能源市场提供应对价格波动和供应风险的集体行动机制,保障能源运输的安全机制,以及开发新能源和节能技术的创新机制。

汪晓风在《数字丝绸之路与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一文中指出,数字丝绸之路的发展动力来自于中国发展战略的外向延展和区域内信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求。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出了对信息通讯及网络领域的市场开放和融资便利等发展类公共产品、信息和网络安全保障等安全类公共产品和网络空间治理的理念共识等规则类公共产品的需求。当前阶段,中国作为倡议发起国应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提供先导性支持,同时促进域内大国、区域已有合作平台以及跨区域国际机制等多种渠道合作供给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域内国家和地区间已建成的合作组织或对话机制,可以成为数字丝绸之路发展和安全合作的机制供给渠道。

四 “一带一路”与世界政治经济

回顾“一带一路”的酝酿和构建过程可以发现,这一战略起初就是以国家最高层面的大战略构想的形态出台的,有着长期和深远的经济与地缘政治意义。“一带一路”战略的持续实施,将大大推进亚欧大陆的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整合、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与此同时,地区甚至世界经济结构以及政治、外交格局也将发生深刻的改变。

例如,近年来,俄罗斯、美国、欧盟、土耳其等主要国际力量在中亚地区展开了大博弈。俄罗斯推出了欧亚联盟计划(Eurasian Union)。西方国家则针锋相对,欧盟推出了“中亚伙伴计划”,美国相继推出了“大中亚计划”和“新丝绸之路战略”。

“欧亚联盟”战略的思想基础来源于新欧亚主义和新俄罗斯思想强烈的民族情怀,强调维护俄罗斯民族的利益,具有一定的排外性,有可能阻碍“一带一路”战略的传播与推广。新欧亚主义认为,俄罗斯是东西方之间的均衡因素,要融合东西方各种文化,成为全球文明新秩序的基础;俄罗斯要利用好横跨欧亚大陆的历史和地理空间,创造出欧亚文明,进而成为

世界文明中的一极；要通过建立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欧亚联盟，连接欧亚两大洲，恢复俄罗斯的大国地位。新俄罗斯思想的核心是爱国主义、强国意识、国家权威和社会互助精神，是俄罗斯实现强国梦的巨大精神动力。历史文化、民族心理和地缘政治因素的统一使得新欧亚主义思想获得了广泛认同。从叶利钦“双头鹰外交”到普京的国家民族主义，俄罗斯实现了民族主义的政治实践，从而完成了俄罗斯政治经济发展模式的重新定位，即从一边倒的西方自由主义向俄罗斯自主研发的欧亚主义的转变，可以说这一过程就是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在民族主义政治理论化过程中最终选择新欧亚主义的过程。但对“一带一路”战略而言，民族主义具有一定的排外性，有可能阻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发展。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作为全球公共产品的主要提供者，一直享有主导国际秩序、把持霸主地位所带来的优势与特权。中国则长期是国际事务的一个参与者和跟随者。在2014年8月接受《纽约时报》专访时，奥巴马说中国搭了30年的便车，指责中国没有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沿循奥巴马的说法，美国海军战争学院的中国海军专家霍尔姆斯(James Holmes)推论道：“如果中国希望与美国竞争获得邻国的好感，那么向它们提供实实在在的好处显然是一个展开竞争的合理途径。”现在，中国利用推行“一带一路”战略的时机，展示乐意提供公共产品、提供“搭便车”机会的形象，向地区国家发出分享中国发展机遇的号召，这显然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转变。

针对美国政学界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和判断，王联合在《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与反应》一文中认为，虽然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已有一定的了解，但尚未准备好在政策上加以充分回应。因此，中国在思考和筹划如何更有效地推行战略方面仍然大有文章可做。中国需要超越宏大的政治叙事，制定详细的规划方案和实施步骤，给予“一带一路”更多的实质内容。

在“一带一路”的总体布局中，欧洲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刘丽荣在《“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对接发展的机遇与障碍》一文中通过梳理欧盟在相关领域的倡议与战略，分析了中欧在“一带一路”框架下进行战略对接发展的可能性和潜在障碍。作者认为，欧洲国家最初低估了“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性。随着亚投行筹建工作的顺利进行，欧盟及其成员国对“一带一路”的立场有所转变。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近期表示，其所倡导的3150亿欧元的欧盟战略投资计划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可以在许多方面实现互

动和对接。虽然“一带一路”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仍然存在许多不确定性,欧洲国家对于这一倡议的看法总体上是积极的。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对中亚、中东和非洲等地区事务的影响力进一步提升,中欧在地缘战略上更为接近;此外,经由希腊、巴尔干半岛连接中东欧与亚洲的贸易通道,对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内部关系构成影响,也为重新界定和深化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提供了新的机遇。欧洲国家对于“一带一路”的立场转变主要是基于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和战略平衡的考量。因此,“一带一路”与欧盟的战略投资计划进行对接和互动,有助于提升中欧关系的战略高度。但是中欧能否在相关领域实现卓有成效的合作,取决于双方管控分歧的能力。此外,中欧战略的对接发展还受到俄欧关系和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在具体经验的借鉴方面,贺平在《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开发银行:历史、现状与未来》一文中,从机构设置和议程制定中“人的要素”、出资比例及其机制影响力两个方面剖析了日本在亚洲开发银行中扮演主导性角色的原因及表现。认为在新一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热潮与机制建设的背景下,2015年年中以来,日本政府提出的“高品质的基础设施投资”理念及其融资策略已经成为日本重振其在亚洲开发银行中主导权的契机。这一理念的出台与中国倡导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银行和全面推进的“一带一路”战略紧密相关,日本的经验教训也为后者提供了诸多借鉴和启示。

在具体国别分析方面,印度尼西亚是“一带一路”战略的一个重要节点,王勇辉、余珍艳在《中国—印度尼西亚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一文中认为,在“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全球海洋支点”的对接下,应加快制定和实施中国—印度尼西亚海洋合作战略,根据两国海洋资源以及海洋产业的各自优势,在合作共赢的原则下,开展港口基础设施建设、临港产业、海洋渔业、海洋科研与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合作,同时,积极鼓励中国国内的海洋省份制定相应的海洋经济发展规划,参与中国—印度尼西亚的海洋经济合作。

目 录

“一带一路”与创新合作机制

- “一带一路”建设与南南合作创新 /张贵洪 邱昌情 3
- 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困境与合作机制探析
——基于合作博弈模型的分析 /杨海燕 16
- 人民币国际化的最新进展与未来的发展 /彭兴韵 齐 璠 34
- 全球治理博弈视角下的“一带一路” /徐长春 53

“一带一路”与海外利益

- 地缘政治视域下的东非油气资源开发
——兼谈中国的角色与战略定位问题 /吴 磊 王 涛
曹峰毓 67
- 撒哈拉以南非洲中国公民安全风险调查
——以刚果(金)为例 /汪段泳 赵 裴 85
- 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政治风险及权益保护
——以中线、北线 B 和南线为例 /黄 河 陈美芳 汪 静
高姝涵 104

“一带一路”与公共产品

- 论“一带一路”框架下澜沧江—湄公河“跨界水公共产品”的供给
/卢光盛 张 励 133

“一带一路”与中国在中亚的能源合作：区域公共产品的视角

/孙瀚源 杜 平 152

数字丝绸之路与公共产品的合作供给 /汪晓风 171

“一带一路”与世界政治经济

美国对“一带一路”战略的认知与反应 /王联合 187

日本主导下的亚洲开发银行：历史、现状与未来 /贺 平 204

“一带一路”与中欧合作：对接发展的机遇与障碍 /刘丽荣 220

中国—印度尼西亚经贸关系发展的机遇与挑战 /王勇辉 余珍艳 235

“一带一路”与创新合作机制